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一卷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一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900×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7\frac{1}{2}$ · 插页 9 · 字数 645,000

1962年6月第1版

1965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27 定价（四）3.05元

第十一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收集了他們在1855年1月底至1856年4月这一时期的論文和通訊。这些作品大部分在德国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新奧得報”上发表过。馬克思从1854年12月底起就是該報的撰稿人。同时，他繼續給当时进步的美国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写文章。和前几年一样，馬克思的某些著作是在厄·琼斯主編的、1852年5月創刊的宪章派机关報“人民報”上发表的。

在政治反动的条件下，在几乎完全沒有工人报刊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的情况下，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須利用进步的資產階級報紙来联系群众并促成有利于无產階級的社会輿論，来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馬克思为“新奧得報”撰稿使他有可能与德国保持更紧密的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认为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有可能对德国讀者闡明国际政治、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的經濟发展和政治状况方面最重要的問題，以及工人运动和資產階級民主运动的問題。

因为馬克思为“新奧得報”和“紐約每日論壇報”写文章几乎要占去他的全部時間并使他中断在政治經濟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而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一部分給“論壇報”写的文章，根据馬克思的請求是由恩格斯

写的。这些文章主要是軍事評論。馬克思也时常把这些軍事評論譯成德文，送到“新奧得报”去发表。在个别情况下，馬克思由于考虑到为德国写通訊稿的特殊条件，于是用自己的文字把恩格斯的軍事論文的内容表达出来，或者对这些論文作某些改动、縮減，有时他自己又写一些对議會辯論和国际事件的評論补充进去。这些文章实际上是两位作者的劳动成果，是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創造性合作的范例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政論文章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在五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同他們的理論研究工作、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論的工作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馬克思在这个时期除了研究政治經濟学以外，还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問題。恩格斯繼續研究軍事科学，首先是軍事学术史，他研究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历史，研究語言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一部分反映在他們的論文和通訊中。同时，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写稿过程中收集了新的实际資料，后来他們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利用了这些資料。例如，在給“新奧得报”写的論文中所引用的关于爱尔兰土地关系的某些材料和工厂視察員的报告后来都被馬克思用在“資本論”中。

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革命的政論文章对于五十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利用在普魯士反动的条件下出版的“新奧得报”的篇幅来进行革命宣傳有困难，尽管在許多問題上和“紐約每日論壇报”的編輯們有分歧，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能够在他們的政論文章中貫徹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路綫。他們揭露了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揭示了資本主义制度的脓疮，抨击了被統治阶级用来为这个制度作思想辯护的反动理論。馬克思和恩格

斯在自己的文章中論證了無產階級在歐洲各國的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最重要問題上的策略問題。他們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分析當時的事件，並且通過具體的實例說明了他們所發現的社會發展規律的作用，繼續具體化了並發展了他們關於社會的唯物主義學說和階級鬥爭的理論。

在本卷文章所談到的很多問題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注意國際關係和當時進入結束階段的克里木戰爭。本卷中有關這些題目的文章，就其內容來說是全集第九卷和第十卷所發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東方問題的論文的繼續。在這一卷里占很大篇幅的是評述歐洲各國首先是英國的經濟和內部政治狀況的文章以及專門論述英國工人運動的文章。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態度來分析所有這些問題，來評價歷史事件的，他們首先注意到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無產階級運動新高潮的前景，他們堅信這種新高潮的到來。正如弗·伊·列寧所指出的，他們在決定無產階級在克里木戰爭時期的策略路線時，是從1789—1871年這一時期的客觀條件出發的，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之間的鬥爭還未結束。在歐洲大部分國家中，就是在1848—1849年革命以後，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也還未解決，擺在日程上的是“推翻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毀這些制度，推翻異族壓迫”。（“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80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在歐洲徹底革命地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改造是勝利地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條件。他們在這一時期的策略，即由無產階級革命者在1848—1849年革命時期也會面臨的那些基本任務所決定的策略，基本上是“新萊茵報”在1848—1849年

的革命策略的繼續，不過它採取了適應已經改變了的历史情况的新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的危机”、“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指示工人階級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要利用国际冲突，即克里木战争来发展反对现存反革命制度的欧洲革命。他們着重指出，工人階級的利益要求使統治階級发动的以反人民为目的的克里木战争成为爆发大规模革命事件的推动力。馬克思希望这些事件“将使无产阶级能够重新取得它在法国 1848 年六月战斗中所失去的地位。这不仅关系到法国，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中欧，包括英国在内。”（見本卷第 208 頁）

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法国无产階級的革命主动性上。恩格斯在“大冒險家的命运”一文中談到“第四次并且是最偉大的一次法国革命”的可能性时指出，这次革命能引起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震蕩。“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就将摆脱硬把他們拴在一起的鎖鏈，而重新形成旗帜不同、目标各異的两大陣营，以代替欧洲今日不稳定的偶然的联合和敌对。那时斗争将只在一方面是民主革命和另一方面是君主反革命之間进行。”（見本卷第 145 頁）

像在 1848—1849 年一样，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他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揭露了在沙皇俄国占統治地位的农奴制度，揭穿了沙皇政府的掠夺计划和沙皇政府的外交活动，揭示了沙皇政府和欧洲其他反革命势力一道在镇压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警察角色。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欧洲列强的統治階級竭力保全和利用沙皇制度作为反对革命的工具的企图。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摧毁沙皇制度、消除它

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使欧洲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

恩格斯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中，揭示了沙皇专制政府企图利用欧洲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反革命性质，揭示了沙皇政府要把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的号召变为自己掠夺政策的手段之一的意图。恩格斯在說明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反动实质时指出，散布这些思想的一些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君主派分子，在1848—1849年在客观上起了支持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等。他們強調指出，这种思想体系会造成各民族之間的民族糾紛，它是同各个民族（包括斯拉夫民族）的民主发展、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馳的。

恩格斯支持南方斯拉夫人和波兰人的独立要求，但是，他并不把这种要求推广到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其他一些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中，恩格斯談到这些民族和它們的前途，他是从他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两著作中就已经提出的錯誤論点出发的，即认为这些民族似乎已失去了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的能力，因而必定要为較强的邻族吞并（关于这一点，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和第8卷的說明）。得出这样的結論主要是因为恩格斯认为集中、建立大国和大民族吞并小民族是資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趋向，而沒有充分地估計到另一种趋向，即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努力爭取民族独立的趋向。历史經驗表明，以前曾加入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不仅显示出它們有能力作为独立的民族

而發展，建立自己的國家組織，而且能夠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民族一道成為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的創造者。

為了民主地改造歐洲、解放被壓迫的民族、通過革命的民主道路聯合德國和意大利，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持必須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革命戰爭，他們揭穿了英法統治階級為了侵略目的、為了鞏固歐洲的君主制和資產階級寡頭政治制度而發動戰爭的政策。

在本卷的許多論文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詳盡地分析歷史事實、外交文件包括 1855 年維也納會議的議定書和議會辯論等材料的基礎上，揭露了克里木戰爭發生的原因和真正的性質。他們揭穿了國家活動家們和西歐官方報刊的虛偽的聲明，這些聲明把英法對俄戰爭描繪成是“保衛”土耳其獨立、反對“專制”爭取“自由”和“文明”的戰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文章中證明，克里木戰爭的爆發首先是參戰各國的經濟利益和軍事利益發生衝突的結果，這個戰爭的性質是由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的利己政策決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歐洲列強在近東的矛盾，說明了這些列強為了分割土耳其帝國、爭奪在巴爾干和黑海海峽的霸權而進行的鬥爭，以及它們在中亞細亞的競爭。

馬克思在“帕麥斯頓。——大不列顛統治階級的生理現象”和其他文章中，揭露了西方列強對待它們的“盟國”土耳其的政策。他揭穿了歐洲列強對落后的土耳其實行殖民奴役的掠奪手段，其中包括在援助的幌子下強迫土耳其接受財政上的奴役。馬克思指出，西方列強把土耳其的外交部和內政部置於它們的監督之下，掌握着它的軍隊并“正把手伸向土耳其的財政”。（見本卷第 425 頁）

在“奇怪的政策”一文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馬克思揭露了英

法統治階級在克里木戰爭中所追求的真正的政治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資產階級寡頭政體的英國和波拿巴法國力求除掉俄國這個在近東和中東的對手，力圖奪取塞瓦斯托波爾，奪得俄國的高加索，消滅俄國艦隊從而削弱俄國的軍事實力，但是它們根本不關心摧毀作為反革命勢力的沙皇制度。西方列強決不是要動搖歐洲反動的、旨在鎮壓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政治制度，而這個制度的基礎早在 1815 年維也納會議上就已奠定了，它的支柱之一就是俄國沙皇制度。相反地，在西方列強的當權者的計劃中却要鞏固這個制度。馬克思在揭露英法統治集團的反革命陰謀時着重指出，克里木戰爭的“目的不是廢除維也納條約，而是通過把土耳其補加到 1815 年的議定書中來鞏固這個條約。有人希望，從這時起保守主義的千年王國就會開始，各國政府將能夠僅僅為了使歐洲思想界‘平靜’而作共同的努力”。（見本卷第 344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議會新聞：關於迪斯累里提案的辯論”、“拿破侖的軍事計劃”、“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戰爭”、“局部戰爭。——關於行政改革的辯論。——羅巴克委員會的報告”和其他的文章中證明，英法統治集團害怕東方沖突變成大陸上普遍的革命烈火，這對它們的外交政策、軍事計劃和作戰方法有很大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西方列強的統治集團在法國和英國煽起沙文主義的情緒，同時努力使戰爭局部化，不讓它變成歐洲人民反對沙皇制度和其他反革命勢力的戰爭。馬克思和恩格斯猛烈地抨擊了法國政府所提出的並得到英國政府支持的“為了局部目的而進行局部戰爭”的計劃，指出這一計劃反映了波拿巴集團和英國寡頭政治對於全歐洲同沙皇俄國作戰將招致革命的後果而產生的恐懼，指出這個計劃是根據法國和英國的上層統治階級的反

革命的、王朝的以及类似的打算而提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要是不揭穿这些国家統治階級的政策，不坚决反对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根本改变战争的性質，不可能使它变成爭取民主改造歐洲的战争。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实现这个任务，首先需要无产阶级力量和革命民主力量积极展开活动。馬克思写道，“在舞台上应该出現另一种力量”（見本卷第 350 頁）来代替英法反革命政府。

在一些文章中，馬克思指出西欧各国对俄国作战的联合是不巩固的，这些盟国之間的矛盾在战争过程中經常暴露出来。在論述英法联盟的几篇文章中，馬克思揭露了英法統治階級进行經濟和政治竞争的历史根源，这种竞争必不可免地引起了它們之間的一切新的冲突。

馬克思把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迫近的經濟危机（它本来就会引起所有矛盾的尖銳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联系起来，他特別注意資本主义的英国，因为当时英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矛盾最尖銳的国家。

在載入本卷的許多論文中，馬克思闡述了英国的經濟和政治状况、統治階級和执政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揭示了这些政策的反人民的实质。馬克思在“傳統的英国政策”、“帕麦斯顿勋爵”、“英国的新揭露材料”、“波兰集会”以及“卡尔斯的陷落”和其他几篇文章中，追溯了英国数百年来的对外政策，指出英国統治階級的政策和外交手腕的一貫特点是背信棄义、假仁假义以及在各种各样騙人的幌子下干涉他国内政，并且指出英国在許多冲突中，特別是在近东和中东，起着煽風点火的作用。馬克思以帕麦斯顿、罗素和其他国家活动家对波兰、爱尔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态度为例子，揭露

了英国政策的反革命性质，指出了英国統治階級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仇視，而这种仇視又往往用同情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假話来加以掩盖。

在“金融市場”、“貿易和財政状况”、“英国的危机”等文章中，馬克思闡述了英国的經濟状况，描述了工业生产、国内外貿易、市場价格、汇率等情况。他根据具体的实例考察了他所发现的資本主义經濟規律性的作用，分析了資本主义生产的周期的发展，指出了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时断时續的性质。他得出了下面的結論：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出現的經濟繁荣时期，已經被英国一些工商业部門、首先是紡織工业部門中出現的蕭条时期所代替。馬克思在1855年也看出了曾在1853年底和1854年初出現过的經濟衰退現象。他在文章中指出，这种經濟衰退現象表现为某些工业品生产縮減、失业現象增长、許多企业实行不完全工作周制、大的貿易公司破产。馬克思曾經預言，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將經受比过去严重得多的經濟危机；危机的严重程度将因英国經濟依賴世界市場状况的这种特点而加深。馬克思的預言得到了证实，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的新的經濟危机在1857年到来了。

馬克思在文章中分析英国經濟状况时，尖銳地批評了以自由貿易派为代表的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这个自由貿易派散布关于推行貿易自由的原則經濟危机就会消失的幻想。馬克思指出这些幻想是要破产的，指出自由貿易派和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关于資本主义无危机地发展的可能性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他揭穿了主張自由貿易的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科布頓、布莱特和其他作为資本主义辯护者、工人階級的凶恶敌人的所謂曼彻斯特學派的代表人物。馬克思撕下了自由貿易派的“自由的捍卫者”、反对貴族

而捍衛人民群眾利益的“維護者”的假面具。他指出，自由貿易派反對國家干涉經濟生活，但是每當僱傭工人階級的运动開始公開威脅剝削制度時，他們就要懇求議會和政府進行干涉。馬克思在文章中嚴厲斥責自由貿易派侵犯工廠視察制度，企圖廢除限制婦女和兒童的工作日的法律。

馬克思為了揭穿自由貿易派關於英國勞動人民是“幸福”的謊言，他根據工廠視察員的報告材料描述了英國工人群眾特別是婦女和童工遭受剝削的觸目驚心的景象。他指出資本主義企業的惡劣的勞動條件，勞動保護幾乎完全沒有，因而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經常遭受威脅。馬克思寫道：“工廠視察員的這份工業通報比關於克里木戰役的任何一份通報都更可怕、更嚇人。婦女和兒童不斷地為傷亡者名單提供大量名額。”（見本卷第 427 頁）

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猛烈譴責曼徹斯特學派的首領們在克里木戰爭中所採取的立場，揭露了科布頓和布萊特的“保衛和平”的言論和他們的“無論如何要和平”的口號的真正含義。馬克思着重指出，曼徹斯特學派要和平是為了“有可能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工業戰爭”。（見本卷第 317 頁）他指出，自由貿易派的假愛和平的詞句掩蓋着英國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企圖，掩蓋着它的爭奪世界市場霸權的鬥爭。

在“上一屆英國政府”、“被推翻的內閣”、“論內閣危機”、“兩種危機”、“不列顛憲法”、“帕麥斯頓和英國的寡頭政治”等文章中，對英國的政治制度作了全面的說明。馬克思在揭露資產階級和貴族的寡頭政治制度的反人民性時寫道：“不列顛憲法其實只是非正式執政的、但實際上統治着資產階級社會一切決定性領域的資產階級和正式執政的土地貴族之間的由來已久的、過時的、陳腐的妥

協。”（見本卷第 108 頁）馬克思着重指出，貴族保持对国家最重要的职位的壟斷，是英国发展道路上主要的障碍之一，是寡头政治制度的柱石之一，这使貴族能够对英国的对外和对內政策起决定性的影响。馬克思在許多文章中指出，寡头政治制度給官方英国的全部政治生活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它反映在議会的活动、政府的构成和政策中，反映在国家和軍事管理的組織上以及各主要政党的立場上。馬克思在說明英国政府（阿伯丁联合內閣和 1855 年 2 月接替它的帕麦斯頓的輝格党内閣）活动的特点时指出，在这两届政府的活动中体现了寡头政治制度的所有缺陷，这两届政府的目的是千方百计地阻碍推行任何威胁英国上层統治階級的政治壟斷的进步改革。

馬克思在“論內閣的危机”、“政党和集团”、“‘晨邮报’反对普魯士。——輝格党和托利党”等文章中，大大地补充了他在前几年的文章中对于英国官方政党、对于由托利党保守派和輝格党自由派輪流执政的傳統的两党制所作的經典性的描繪。他着重指出托利党落后的保守主义，托利党是“教会和国家、保护关税政策和反天主教問題上的一切旧英国偏見的”热烈捍卫者。（見本卷第 245 頁）同时他揭穿了輝格党人这些資產階級貴族代表的装装样子的自由主义，他們和托利党人一样，竭力巩固寡头政治制度，不过他們在这方面表現得更为狡猾，更能随机应变罢了。馬克思指出，輝格党人“毫不犹豫地拋棄了那些妨碍他們实现操纵国家职位的世襲权利的偏見”，他們“根据不同情况”更換“自己的常礼服和观点”。（見本卷第 245、246 頁）

載入本卷的“約翰·罗素勛爵”这篇抨击文是为揭穿輝格党的政策而写的，它抨击的是这个“追求名位者的政党”（按照馬克思的

說法)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一个多次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著名的国家活动家。馬克思在这篇抨击文以及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指出,托利党和輝格党的斗争只不过是統治阶级的两个派别之间的爭吵,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剝削者的各个派别也日益团结起来,因此这两党在政策上的分歧也就日益消失。在野的这个或那个政党对政府的猛烈攻击只不过是排挤对手下台的一种手段。馬克思在揭穿英国两党制这种结构时指出,这个或那个政党执政时,它仍然是继续奉行它的前任者的政治方针。这两个政党都同样致力于使资产阶级和贵族上层分子保持对国家政权的壟断。

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英国寡头政治制度所固有的深刻矛盾,指出陈旧的政治制度不适合英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的议会政党已经蜕化。馬克思写道:“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壟断权的旧的议会政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些集团罢了。”(見本卷第 51 頁)馬克思阐述英国政治制度的文章,清楚地说明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发生的旧贵族政党解体并演变为英国资产阶级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过程,它反映了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反映了这个阶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地位的巩固。

馬克思在論英国的那些文章中非常注意英国工人阶级。在“倫敦飯店中的群众大会”、“論鼓动运动的历史”、“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关于改革运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人民同警察的冲突。——論克里木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认定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活跃。馬克思在指出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

表人物、其中包括西蒂区商业金融集团反对派更加努力地企图使英国工人阶级屈从于他们的影响的同时，总是不断地强调宪章派对资产阶级分子类似的企图进行反击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介绍了厄内斯特·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活动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内容，这些活动家指出资产阶级反对派反对寡头政治的言论是温和的和不彻底的，指出资产阶级反对派害怕工人运动并准备和贵族妥协，而且还揭穿资产阶级领袖们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行政改革这种温和的资产阶级要求是要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获取国家职位开辟更广阔的途径，而宪章派则与此相反，他们要求以人民宪章的六项条目为基础进行广泛的民主选举改革。马克思认为宪章派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竭力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保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地位，保证它在争取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

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的“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引起了很大注意。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历史意义，这一纲领的中心就是要求普选权。马克思着重指出，在五十年代的英国条件下实现这一纲领就能够为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利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道路。马克思指出：“这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见本卷第301页）这篇文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要求具体地历史地对待政治口号，包括对待普选权的口号。他们教导说，普选权这个口号的内容和意义是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说在法国以及整个大陆普选权口号的内容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范围，那末在英国的条件下，这个要求和宪章派纲领的其他条目一

样，具有另外的性质。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大陆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們认为英国是例外。他們估計到当时英国的一些特点，例如英国同法国和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相反，沒有发达的軍事官僚的国家机关，并且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英国居民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权，其办法就是实行普选权，采取激进的措施来改造議會制度和使英国整个政治制度完全民主化。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个前景出发而对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作了评价，但是他們认为英国无产阶级还有通过非和平的道路来夺取政权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是它的政治觉悟和組織性的提高以及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爭取恢复宪章运动的斗争能促使这个任务得到解决，但是这个希望沒有实现。宪章派在五十年代想掀起群众性的爭取宪章的运动的尝试沒有成功。宪章运动本身不久便完全退出了舞台。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英国工人中間机会主义傾向的加剧，而机会主义傾向的加剧則是由英国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断地位和资产階級从殖民地取得巨大超額利潤收买了英国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工人貴族”而造成的。

本卷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闡述了法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对外和对內政策。在上面已經提到过的“大冒險家的命运”、“拿破侖的軍事計劃”、“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辯論。——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拿破侖最近的詭計”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波拿巴法国在战争中的真正目的——力图进行掠夺和巩固波拿巴政体。恩格斯在強調指出波拿巴法国是发动克里木战争